

中华民族废除 不平等条约

斗争史

徐文生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华民族 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

徐文生 编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 / 徐文生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81104-909-1

I. 中… II. 徐… III. 不平等条约—中国—史料 IV.
D82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4989 号

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

徐文生 编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gfz87@126.com)
封面设计	翼虎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西南交通大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 × 203 mm
印 张	13.25
字 数	34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4-909-1
定 价	2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绪 论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其危害	1
第一章 早期废约的努力与抗争	25
第一节 人民大众反抗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25
第二节 晚清与北京政府成立初期的废约努力与抗争	42
第三节 北京政府成立初期的废约努力与抗争	57
第二章 巴黎和会时期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兴起	67
第一节 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兴起的背景	67
第二节 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斗争	80
第三节 全国各界为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的坚决斗争	92
第四节 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初步成果	104
第三章 华盛顿会议前后北洋政府的废约斗争	114
第一节 华盛顿会议前夕的废约活动	114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废约斗争	123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后北洋政府的废约活动	146
第四章 国共合作, 废约运动呈现新局面	160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早期反帝废约思想	160
第二节 广州革命政府领导的废约斗争	165
第三节 五卅风暴推动下的北京政府废约外交活动	176
第四节 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废约斗争	193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改订新约运动	204
第一节 改订新约的背景	204
第二节 改订新约的艰难历程	209
第三节 对改订新约运动的评价	259
第六章 抗日战争前后中华民族的全面废约斗争	271
第一节 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271
第二节 中国与同盟国的废约斗争	288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废约斗争	325
第一节 反对《中美商约》的斗争	325
第二节 中苏之间的废约活动	335
第三节 对帝国主义在华遗留问题的清理	365
第八章 港、澳艰难的回归历程	381
第一节 香港、澳门问题的形成	381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处理港澳问题的态度	388
第三节 香港的胜利回归	396
第四节 澳门历史遗留问题的圆满解决	410
参考文献	417
后 记	419

绪论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及其危害

在国际交往的历史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出于某种需要而互订条约是必要而正常的外交活动。中国在 1840 年以前，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像 1689 年与俄国政府签订的《尼布楚条约》、1792 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等，都属于平等的外交条约。在 1840 年以前，属于平等性质的条约共有 7 项。

在近代 100 多年的历史中，原来那种正常的外交活动逐渐被强权政治所取代。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武力，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头上。以 1842 年中英订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为开端，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 1000 多个不平等条约”^①。其中，六大列强——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俄国，与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占全部条约的 75%。依仗这些条约，它们或者从中国攫取经济利益，或者勒索巨额赔款，或者侵犯主权。这些由文字写成的条约，变成了一条条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锁链，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对中国政治的干涉完全“合法化”。近代中国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帝国主义依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割占领土、索取特权、干涉内政、奴役人民的血泪史，又是中国不屈不挠地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史。

^① 胡绳：《以史为鉴，爱我中华》，人民日报，1991-08-29。

一、列强利用种种卑劣手法，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一）用野蛮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就范签约

在近代近百年的历史中，许多至关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在帝国主义猛烈的军事进攻之后，借着侵略战争得胜后的淫威，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

《南京条约》既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之起始，也是列强用军事进攻迫使中国政府就范签约的先例。1840年6月，英国为保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侵略者组成“东方远征军”，依仗“坚船利炮”，想用军事打击来换取更大的侵略利益。由于腐败的清政府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加之经济技术落后，武备松弛，不可避免地在一场正义战争中连遭败绩。侵略军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上海、镇江，然后进逼南京城。南京是我国江南重镇，十朝名都。这里“钟山龙盘，石城虎踞”，实属险要天成。贯通江南数省的长江由此向东入海，而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也在此通过。南京周围都是江南广大富庶之乡，南来北往的货物，输往京城的粮食、税银也大多经过这里。占领南京，就等于卡住了清政府的咽喉要道。因此，当侵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清政府真的乱了方寸，放弃了任何继续抵抗的努力，签订了城下之盟。1842年8月29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

《南京条约》订立以后，清政府以为得到了“万年和好”的凭证，于罢兵之后，照样歌舞升平，不思任何振作。然而，《南京条约》并未满足帝国主义列强贪得无厌的胃口。它们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滞销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大门开放得还不够，对中国的打击还不狠。它们认定，只要使用炮舰政策制服清政府，就能再给中国套上新的锁链，取得更多的在华利益。

1856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又勾结法国组成侵华联军,并于12月攻占广州。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破天津外围的大沽口,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当时约定一年后在北京换约(双方互换得到本国政府认可的条约文本)。但是,率领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和军舰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却公然拒绝遵守清政府规定的由北塘经天津再入北京的路线,而是坚持由大沽口经白河入京。1859年6月,英法舰队擅入大沽口,遭到驻守中国部队的狙击,受到重创。这一事件使成为英、法两国再次向中国大规模开战的借口。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塘、大沽口,接着占领天津,同年10月占领北京。在北京,英法联军抢劫并焚烧了圆明园。至此,清政府完全被西方列强的武力所征服,被迫接受了它们提出的苛刻条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再次尝到凭借武力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索取在华特权的甜头。

直接动用武力,把屠刀架在清政府的脖子上,到那时,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这成了列强与清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西方的强盗这样试过,并且成功了;东方的强盗也不会丧此“良机”。

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对中国的侵略更是野心勃勃,穷凶极恶。1894年,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战争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海、陆两个战场上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双方在陆路先后进行了平壤战役、辽东战役、山海关战役以及荣城战役,中国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在海路,进行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尽管中国海军广大官兵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但终因清朝决策当局奉行畏敌避战的指导方针,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军事上的惨败,带来了谈判桌上的耻辱。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求和。作为议和代表,李鸿章终日听到的是日本政府的危言恫吓。日方代表把拟好的条约草案摊在桌子上,只准中方代表表示“允否”两字,不许提出异议。同时,

还派 20 艘战舰由马关驶出开赴大连,摆出一副只要谈判破裂就诉诸武力的架势。清政府又一次屈服,于同年 4 月 17 日与日本签订了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马关条约》。

1900 年,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火焰燃遍了北部中国。帝国主义胆战心寒,又使出了惯用伎俩,出动了由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个国家组成的强盗军队来进攻中国。7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组建了“都统衙门”。8 月 14 日攻陷北京,京津一带惨遭荼毒。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先是利用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声势对列强进行报复,后来看到无法取胜,又反过来剿杀义和团以取悦列强。到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她却仓皇出逃,委派李鸿章等为全权议和大臣,对中国权益再次进行“大拍卖”。

帝国主义列强以战胜者的姿态占据北京后,一面继续四面出击,扑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烽火;一面向清政府发出种种要挟,先要惩办祸首,又说要流亡在外的清政府先回北京再进行谈判。种种刁难,使得躲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坐卧不安,寝食俱废,终日探听是否有要发落她的消息。慈禧太后指示,只要能保住清朝统治,谈判代表就可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于是,帝国主义列强把最沉重、最刻薄的一条“锁链”——《辛丑条约》,又套在了中国人的脖子上。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更是以武力为后盾,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各种侵略条约、协定,不断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阴谋。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法西斯在独霸东北之后,突然向中国腹地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法西斯投入了 10 万军队,企图一举拿下上海,从而进取全中国。驻沪十九路军英勇抵抗,连连击退敌人,打碎了日军“四个小时就能占领上海”的梦呓。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十九路军在苦战无援的情况下,于 3 月 1 日撤退,上海遂被日军占领。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出卖了英勇抗日的上海军民,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

一年之后，旧剧重演。日军占领了山海关，攻下了热河省，接着占领通州，对北平、天津形成包围之势，使整个华北陷入危机。在日本炮舰政策的淫威之下，国民党政府再一次表现出懦弱和无能，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使得日本法西斯势力实际上控制了华北，并为以后发动“七七”事变及全面进攻中国铺平了道路。

上述条约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以军事进攻的方式，卡住中国的脖子，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这类条约，虽然只占全部条约数量的很少一部分，但是它们的危害比其他类型的条约严重得多。因为它们都是在侵略者的枪口之下订立的，在条约未订立之前，就已经使我们的国家饱受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条约签订之后，国家和人民又付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甚至被迫割让土地、牺牲国权的沉重代价。而且越到后来，条约的政治奴役性就越明显，如《辛丑条约》中规定不准中国人民进行任何形式的反帝斗争；《淞沪停战协定》在承认日本占领上海部分地区的同时，还答应取缔全国的抗日活动，并把坚持抗日的十九路军调离上海，发往福建“剿共”。因此，用武力卡住咽喉，迫使就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强迫中国政府与之订立不平等条约时所使用的最卑劣的手段。

（二）趁火打劫，狐假虎威，均沾利益

在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有不少条约是一些西方国家不费一枪一弹，借着别国发动战争的机会，用讹诈的方法乘机要挟、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

1842年中英订立《南京条约》后，法国、美国侵略者也垂涎欲滴。他们赶快跑到中国，也要得到至少与英国相等的好处，甚至“欲驾出其上”。1844年2月，美国政府派国会议员顾盛率领3艘军舰，杀气腾腾地来到澳门。他声称不与广州的地方官员谈判，而是要与北京的皇帝直接谈判，如果不满足其要求的话，就要“把这种行径，看做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并赤

裸裸地威胁说：“本国政府或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顾盛甚至觉得这样的威吓还不够厉害，又模仿英国的样子，开军舰闯入黄埔港并放炮示威。这回真把清政府吓坏了，赶紧派员与英国人谈判签约的耆英在广州与顾盛开始谈判，最后于1844年7月在澳门边上的一个渔村——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的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就派拉萼尼为特使，率领7艘兵舰、1艘轮船来到澳门。清政府闻讯，赶忙主动派耆英前往交涉。可是，狡猾的法国人却不动声色，既不与耆英交涉，也不说明来华意图，弄得耆英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只得把中英、中美交涉的文件副本交给法国使者，由他们自己看着办。法国人的这种“战术”，既不费一枪一弹，也不用危言恫吓，只是装装样子，就使心有余悸的清政府认输投降。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在法国兵舰上签订。这个条约与中英、中美条约一起，构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开创了外国侵略者用不平等条约作锁链，向中国政府勒索权利的恶劣先例。

1847年3月，瑞典、挪威与清政府订《五口通商章程》；1851年8月，沙俄同清政府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些国家都援引了“利益均沾”的原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几乎与英国侵略者同样的权益。

1858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清政府内有太平天国起义的连天烽火，外有英法联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危险时刻。这时，早就对我国黑龙江流域怀有吞并野心的沙俄，乘机伸出了黑手。这一年5月，当英法联军在天津打败清军的消息传到俄国时，沙俄便派出侵略军开到了瑷珲城，要强迫清政府与它重新划定中俄边界，妄想推翻1689年《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关于中俄边界的规定。这两个条约，曾经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中段边界。当时规定，中俄边界的东段以额尔古纳河、格尔毕齐河以及外兴安岭为界。在当时，黑龙江是中国的一条内河，富庶的黑龙江流域

则属于中国的内陆地区。而这个铁的历史事实正是沙俄处心积虑地要竭力改变的。沙俄军队在瑷珲城外一边放枪放炮，施以威吓，一边向清政府提出重新划界的要求，并声称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就要联合英国对华宣战。在如此狐假虎威的恫吓之下，清政府只得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之谈判，被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黑龙江北岸约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只有原来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照旧居住，归中国官员管辖；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往来，别国船只不得航行。沙俄通过这个条约不仅吞并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而且还为继续霸占中国其他领土埋下了伏笔。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逞凶肆虐，咸丰皇帝出逃热河。沙俄又来趁火打劫，沙俄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向清廷留在北京主持“议和”的恭亲王奕訢提交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逼迫奕訢“一字不能更易”地答应下来，否则“兵端不难屡兴”。奕訢无奈，被迫于 11 月 14 日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除了迫使清政府确认《中俄瑷珲条约》外，还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约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俄国；确定于俄国有利的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原则和办法；赋予俄国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贸易及其他特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借英法联军侵华之机，使用讹诈欺骗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它虽然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却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割占了我国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攫取了大量在华经济、政治、外交利益，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受惠者。马克思曾愤怒地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① 恩格斯也谴责说：沙俄“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

①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 页。

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它“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

列强借别国给清政府军事上的打击之机竞相向中国索取利益的活动，在 19 世纪末叶达到高潮。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列强看到貌似强大的大清帝国远不如一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小国——日本，稍加重创，它就交出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还有多达 2 亿两的白银。看到这么多的油水源源流入东瀛岛国，列强们眼馋了，手痒了，纷纷争先恐后地向中国扑了上来，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把这个东方大国瓜分完毕。

《马关条约》墨迹未干，法国政府就同清政府签订了有关《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名曰“会商”，实则是命令清政府给予法国在云南商务上的特权，包括少收税、减免子口税，开矿必“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修路架线也要“由两国酌商要订办法”。这就等于把云南划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继法国之后，其他列强也竞相向中国租借土地，划分势力范围，从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争先恐后地与中国政府订立条约，把某一省或某一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条约主要有《中俄密约》、《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中日福建不割让来往照会》、《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等。这些条约都是帝国主义列强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政府遭惨败而不能自保的时机，强加于中国的。1899 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的“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取得特权的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并未征得清政府同意，擅自与其他国家交换照会，要求在列强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享受同等的贸易地位，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①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 页、第 37 页。

一个强盗冲锋于前，依仗军事打击的威力逼中国政府俯首就范，其他强盗紧跟其后，借着同伙武力的余威，一哄而上，索取利益。这就是早在《南京条约》中就规定好了的“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的“利益均沾”原则。^①英国人可以“一体均沾”，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都可以如此仿效。用这种方法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既不必动用本国军力、财力，又可以获得大量好处，最为廉价实惠。所以，各国列强除了用武力逼签条约外，无不睁大眼睛，等待趁火打劫的机会。而利用这种手段签订的条约、协定之数量远比用武力迫使中国就范者要多。

（三）借口调停“有功”，“邀功请赏”

在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②清政府当时并没有对这条规定过多注意，只想早缔约早安逸，签完字后便可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十二年还没到，列强就找碴儿与清政府过不去了。他们先打招呼，要清政府考虑十二年期满时修约的事，看见清政府没有动静，就主动出击。照理说，修约之说是中美《望厦条约》提出的，只与美国相关，而与英国、法国、俄国并无关系。可是，偏偏英、法在修约问题上闹得最凶。修约不成，它们就联合出兵，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此刻，俄、美两家却扮演着一个“居间调停”的角色。见到英、法对华用兵，美国政府赶忙派公使列卫廉到香港，并指示他“在一切和平的方式上，同英、法两国的公使合作”。列卫廉到达后，假惺惺地声明，他要在中国和英、法之间“严守中立”，表示美国

① 《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见李济琛、陈加林主编：《国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望厦条约》，见《国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不准备对华进行战争，同时他又说，英、法发动战争的借口是“正义”的，因此他支持英、法的行动。沙俄此刻意在图谋中国北方领土，看到三个强盗合伙欺侮中国，马上也派了全权代表普提雅廷来到香港，准备和他们一道行动。他与美国公使一样，也假装出一付“严守中立”的样子。

英、法发动战争的前一天，美国代表正与中方代表谈判。美公使列卫廉得到英法马上就要开战的消息，便悄悄地告诉自己的谈判代表，要他不动声色地“用最和蔼亲切的方式，把一切谈判中止”。这位代表心领神会，装腔作势地表演了一番，还把一些地图、铅笔、历书等洋玩意送给了中方代表，约好第二天继续谈判。中方代表丝毫未觉察出情况有变，面对美国方面的“热心说和”再三表示感谢，甚至还像朋友似地托这位洋人去打听英、法的消息。这个美国人承诺下来后“欣然而去”。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

另一个调停人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也是个无耻的骗子。他在天津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而让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兵临瑗珲城下，“夜间施放枪炮”，恐吓正在与俄国谈判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奕山向咸丰报告说，在谈判期间“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但同意了《瑗珲条约》，还同意了中俄《天津条约》，签约的时间比与英、法两国订立的条约还早十几天。看到清政府与沙俄签了约，美国人也赶过来，硬说自己“调停有功”，非要清政府作出“报答”不可，于是也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俄、美两家都得到了与英、法一样的利益。美国学者丹涅特描述美国在当时的形象时写道：“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奉派到世界的彼端（中国），手提篮筐，站在树下。静待着树上的同伴将果实摇落，甚至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

列强用“邀功请赏”的手法向中国索取利益的行径，在近代历史上屡屡发生。1896年，沙俄借口帮助中国干涉“还辽”有功，公开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它借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把李鸿章请去，

贿以巨款，与之签订《中俄密约》，从而把我国东三省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不久，德国也来了，它也认为在“还辽”中出了力，有“理由”向清政府要些酬劳。于是，中德《汉口租界条约》和《天津租界条约》没费什么力气就签订了，从而使德国在长江沿岸和北方重镇天津开辟了侵略中国的立脚点。法国也是有“功”者，同样不会放过这次敲诈的机会，它迫使清政府把中法战争所订的条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补充，使法国在云南的势力更为巩固。

可是，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充当调停的人往往与外来干涉者是一丘之貉，他们一个真打，一个假拉，充当所谓“调解人”的国家往往拉“偏架”，即束缚住中国的手脚，让打手更容易击中要害。也有些时候，列强之间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于是就有一方在一定程度上稍稍抑制另一方的侵略野心，然后借机逼着中国政府付出酬劳，用这样的方式来平衡列强之间的侵略利益。因此我们说，“邀功请赏”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近代中国获取权益的一种最简单、最便宜的手段。

（四）利用各种事端罗织名目，借题发挥，乘机敲诈

在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以后，西方国家成千上万的冒险家、投机者、流浪汉蜂拥来华，依仗列强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制造出一系列事端。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把这类事件的发生看做向中国敲诈勒索、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近代中国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和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就是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19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者占领缅甸，继而窥伺我国云南地区。1874年，英国组织了一支武装的“探险队”，擅自勘测缅甸通往云南的道路。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官马嘉理则从内地前往边界迎候，然后率队向云南腹地进发。当这支队伍来到云南边境时，由于探路队入境前没有先行照会地方官，入境后又四处搜集

情报，勘测地形，引起边境居民的疑惧。在行至曼允山寨时，遭到当地人民的阻击。在双方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当地群众把马嘉理和几名随行人员杀死，英国探险队行程受阻，被迫退回缅甸。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马嘉理案的发生给英国侵略者提供了机会。他们借题发挥，照会中国政府，要求解决“马嘉理案”，索取赔偿。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在一周之内连续向清政府提交了十几个照会，威胁、恐吓，无所不用其极，还以“绝交”相要挟。经如此讹诈，清政府只得派李鸿章与之谈判，并于1876年9月签订《烟台条约》。除解决马嘉理案外，英国还利用这个条约，得到了更多的通商口岸，索取到其商品在租界免税免捐，其人员可在中国西南地区任意“探访路程”等权利。借着这个命案，英国得到了相当多的与命案无关的侵略权益。

近代发生的各种“教案”也是西方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绝好理由。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会势力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唆使教徒欺压乡民，激起了民教之间的矛盾和仇恨。1897年，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曹州一带仗势欺人，激起了百姓的无比愤怒。11月1日，巨野县农民袭击了天主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2人。在其他州县也出现了焚教堂、杀教士、反洋教的事件。这就是有名的“巨野教案”。巨野教案的发生，使得早就想“攘夺一个合适的海口据为己有”的德帝国主义喜出望外。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时机，几天之后就派出军舰前往青岛海港，一举侵占胶州湾。其实，清政府早已料到德国人要找借口，所以巨野教案一发生，马上就派山东巡抚前往“缉凶”，在德国人未到之前就抓住4名“凶盗”迅速惩办，以堵德国入侵之口实。不料，德国人根本就不管清政府如何行动，而是完全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侵占胶州湾后，它立即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青岛变为自己的租界，并把山东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次中外交涉本来都是由具体事件引起的，而且主要责任不